

走出文革連載31

走出文革

在烈日和暴雨下

(接上一期)

對於當了紅衛兵的胡司令而言，李維康雖然不像阿慶嫂那樣有救命之恩，但畢竟讓他去清華大學風光了一次。“俺胡某講義氣，終當報償”，李維康獲得了喘息之機。

一年後，我畢業離校，李維康說她要到清華來送我。我騎自行車將她從清華南校門接到宿舍。在雜亂擁擠的鬥室裏，她為我們這些即將背井離鄉，前途渺茫的清華學子，清唱了幾段激越的樣板戲。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維康以曲代酒，一曲又一曲，令我感動不已。

隨後的一年半中，我在四川省一個解放軍農場裏收到了她數十封來信。信中有苦惱，也有歡樂，更多的是她的遭遇和身邊的人和事。對她日後的藝術生涯產生重大影響的一件大事便發生在這段時間。

她在來信中向我敘述了事情的經過。有一次江青在聽錄音時注意到李維康的嗓子裏有一種金屬的聲音，如同人們通常所說的“金嗓子”。按照江青的指示，李維

康被秘密調入中國京劇團，實現了她多年的夢想。

然而，當這個秘密傳到戲校後，一部分學生（我希望這中間沒有胡司令和他的人馬）涌到中國京劇團要求將李維康揪回戲校繼續受批判。李維康被迫回到戲校。不久，中國京劇團再次將李維康調入。當戲校的學生繼續鬧事時，工宣隊出示了江青的“尚方寶劍”。這一次，輪到鬧事的學生灰溜溜地回到了學校。

在李維康成為名人後的今天，李維康“三進中國京劇團”（加上文革前李維康在中國京劇團參加演出一次）已成為眾多記者筆下的軼事。但所有的報道都隱去了江青介入這件事的情節。

我想，這大可不必。

江青雖因她的作為而成為歷史罪人，但在藝術上，她并非草包一個。她在賞識李維康的藝術潛質這件事上並無讓人詬病之處。她的賞識對李維康的藝術成就亦毫無發傷。

當時的中國京劇團是四人幫把持的重要地盤。難能可貴的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李維康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

在到中國京劇團後給我的來信中，她多次談到對周圍環境的苦惱。她也看不慣江青的那幾個紅人頤指氣使的嘴臉。她告訴我，她最欣賞杜近芳在團裏剛正不阿的態度，雖然杜近芳在團裏受到排擠。

由於她的正直的品質，四人幫倒臺後，她脫穎而出。1977年和1981年，她被選為中共十一大和十二大主席團成員。

我離開農場後便很少和她通信了，但我每次回北京時都會去看望她。有時去她的住處，有時一起上餐館吃飯。她還是那樣單純可愛，絲毫也沒有因為漸漸有了名氣而顯得生疏。就連她父親因為歷史問題被“揪”出來這樣的事，她也會和我談她的苦惱和顧慮。

有一次她請我去看她的演出。我去後臺拿票，她已化好妝，手上還拿着一個饅頭在啃。我很驚訝，問她：“你怎麼就吃這個？”她說：“是呀，我得靠這個饅頭頂一臺戲呢。”

我從來都不知道她經過多少刻苦的努力才取得後來的成就。這個小小的饅頭使我看到了輝煌後面的辛苦。

在看演出時，有兩個女孩子坐

在我的後面，她們顯然是李維康的粉絲，每次幕間休息時都會興奮地評論李維康。因為有AB角的關係，她們覺得非常幸運能碰上由李維康上場。然後是一大串我聽不懂的對李維康唱腔的專業評論。

我將這兩個女孩子的故事告訴了李維康，她很高興。其實，我這是借花獻佛。我從來也沒有對李維康評價過她的唱腔和表演，因為我對京劇藝術一竅不通，就連本文開頭對李維康唱腔的評價也是臨時惡補來的。

我在1982年去美國後便和李維康失去了聯繫。1986年，我回國接孩子。當時，李維康因為在電視劇《四世同堂》中扮演韻梅一角而聲名大震，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1966年，老捨不堪紅衛兵的凌辱，在駱駝祥子拉車謀生的北京城裏投太平湖自殺。

他至死都不會想到，在他投湖的同時，他筆下的“烈日和暴雨”正被紅衛兵創造性地用來折磨年僅十八歲的北京戲校學生李維康。

也算是一種宿命般的巧合，二十年後“梅開二度”，扮演過鐵梅的京劇演員李維康意外地客串電視劇，成了老捨筆下的韻梅。我打了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一個電話給她。她十分高興，約我一起吃飯見面。

不料，在約定見面的前一天，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和她的兩張彩色照片。一張是生活照，一張是扮演蘇三的戲照。

她為她不能赴約而抱歉。

從此，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

這未必不是一個最佳的結局，她留在我記憶中的形象將永遠年輕美好。她晚年時爐火純青的藝術造詣和各種成就應當留給舞臺，留給政協，留給公眾。當然，還要留給戲校裏那些可愛的孩子。在他們中間將會產生新的、更加美麗的故事。

煤油燈下的報告

我曾兩次去巴黎出差。

巴黎當然是美麗的。但當我第一次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時，震撼我的心靈的却并非她的美麗，而是那種恍若走進了時光隧道的感覺，年青時讀過的和這座城市相關的歷史和文學作品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的眼前。這裏的一磚一瓦似乎都曾經被那些歷史巨人觸摸過，正在默默地敘說着

所發生過的一切。我在塞納河中的西岱島上尋覓巴黎聖母院，坐在這座哥特式教堂的長椅上靜靜地感受雨果的筆觸；我又在左岸拉丁區尋覓普羅克普(Le Procope)咖啡館，坐在古色古香的餐廳裏傾聽伏爾泰、盧梭、丹東、羅伯斯庇爾、馬拉以及巴爾扎克和雨果等當年聚在這裏大聲爭辯的回音……

歷史，更準確地說用文字記載下來的歷史，當然是由大人物們創

造的。然而，一個時代的記錄除了盧浮宮等博物館裏珍貴的藝術作品和文物以外，更主要是保存在文學作品中眾多小人物的命運裏。

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塑造了兩千四百多個人物，被稱為社會百科全書。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描寫了貴族階級註定滅亡的命運和新生資產階級的貪婪本質。

對納粹德國的了解，除了通過紐

倫堡大審判和威廉·夏伊勒的宏篇巨作《第三帝國的興亡》以外，我們還有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電影

《辛德勒的名單》。它不僅深刻地揭露了德國法西斯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恐怖罪行，而且以其特有的藝術魅力展示了人類的良知永遠不會完全地泯滅。

辛德勒，一個普通的德國人，在那個充滿仇恨和荒謬的時代拯救了一千多個猶太人。他的故事

讓我們去深深思考和感受那段歷史的傷痛。

對十年文革的思考，我寄希望于刻畫那個時代芸芸衆生命運的作品出現。我的這一篇回憶或許可以為此提供一點素材。

王醒民，清華大學的一個普通學生，六十年代末在河北省武清縣一個叫“四馬營”的村莊裏寫他的“煤油燈下的報告”時，他祇是希望拯救自己。(未完待續)

民國風雲錄連載8

民國風雲錄



本報特約作家 陳志輝

節選六 初現裂痕

(接上一期)

國民黨內外對蔣介石幾個月來的變化開始議論紛紛，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蔣介石正在成為新的軍閥，北伐的性質正在改變。於是，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中央委員和各省市代表聯席會議，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可嘆國民黨在失去孫中山和廖仲愷之後，實在無領袖之良才，竟做出決議，要請回汪精衛主掌國民黨中央，以制衡蔣介石主掌的軍事大權。

另一方面，在北伐軍攻克武昌之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北遷的問題就提上了議事日程。對於廣州大本營的人們來說，北遷的目標地自然而然就是武漢，這是目前北伐軍控制區域裏唯一比廣州更大的城市。由於武漢經濟發達，還是全國交通大樞紐，又非常靠近北方前線，對提升國民政府支援北伐的效率非常有利。

然而，當蔣介石進入南昌後，

却給中央執委發去一封電報，要求將黨和政府首腦機關遷到南昌而不是武漢，理由是總司令部在南昌前綫，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應該跟總司令部在一起。

可以想見，這封“挾軍自重”的電報正好支持了質疑蔣介石的觀點，一時間，反蔣情緒就在國民革命陣營內部公開了。為了解決矛盾，廣州一方由宋慶齡出頭，組織了中央慰問代表團，前往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慰問北伐將士，並與蔣總司令等舉行聯席會議。

中央慰問代表團於12月2日到達南昌。12月7日，在風景勝地廬山上舉行了在南昌的中央委員聯席會議。蔣介石的目的很明確，希望代表們留下，支持他“遷都”南昌的動議。代表團成員們事先就知道蔣的立場，無不持反對意見，不過為了不使蔣主席難堪，大家均使用一些委婉的詞句來表達，希望軍方認識到武漢比南昌在政治、經濟和交通上的優越性，“遷都”武漢實為明智之選。這樣雙方你來我往，並沒有形成多少共識。

沒有實質性成果的廬山聯席會議結束後，廣州來的中央委員們一起轉道九江，乘船前往武漢。然後，在武漢聚集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一起開會，自稱“最高聯席會議”，在中央和政府未正式遷入武漢之前，行使最高職權。委員包括宋慶齡、孫科、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陳友仁、王法勤等，鮑羅廷作為顧問列席。推舉徐謙為主席、葉楚傖為秘書長。這個“文官”最高聯席會議之後，在武漢的軍事將領唐生智、鄧演達、張

發奎等紛紛表態，服從最高聯席會議的領導。

1926年12月底，廣州的留守大本營開始北遷，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和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副主席張靜江（張已經將主席之位讓給了蔣）帶人繞道訪問南昌，受到蔣介石極其熱烈的歡迎。但當蔣提出要他們留在南昌另起爐竈後，兩人都沒有馬上答復。經過幾周的觀望，譚延闓還是決定去了武漢；而張靜江兩邊都不想得罪，竟然選擇去了上海。

蔣介石看到張靜江和譚延闓都不敢支持自己，才正視自己唯有軍事上握有實權，而在黨、政兩個方面都沒有爭鋒的實力。他忿忿難平：我領導的北伐節節勝利，可黨內和政府內對我却越來越不尊重，這是對我和北伐軍的羞辱！

正在蔣介石生悶氣的時候，侍從來報：張群先生求見，說是總司令的同鄉和同學。他立時轉忿為喜，連忙出迎。張群是蔣介石留學日本振武學校時的同學，辛亥革命爆發後，兩人偷渡回上海，參加了陳其美領導的上海起義。起義成功後，陳其美被推舉為都督，蔣介石在二十三師師長黃郛手下任團長，張群就是團參謀長。

叙舊過後，蔣介石當即委任張群為總司令部總參議。這對蔣是一個提醒：為什麼不把自己的朋友圈組織起來呢？有了自己的團隊，就可以跟武漢分庭抗禮。於是，他馬上讓張群去找黃郛，前來加入自己的陣營。同時，他又從廣州招來了戴季陶、吳鐵城等過去的鐵哥

們，加上張靜江和陳果夫、陳立夫等，一個以蔣為核心的政治小團體開始形成。

黃郛曾多年在北洋政府任要職，1924年一度出任內閣總理，因此，黃的到來引起了世人的關注。武漢、九江一帶的國民黨黨報對黃氏不遺餘力地攻擊，罵他是政學系北洋舊官僚和走狗，不應該讓他混迹於我們革命陣營之內。蔣介石大發雷霆，在總理紀念周上說：“黃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難道我們革命，連朋友也不要了嗎？”

黃郛沒有辜負蔣介石的仗義，很快就幫蔣找到了走出困局的出路。黃郛指出：要想擺脫武漢方面的黨政領導，最重要的是掌握自己的財政命脈，沒有財源，養兵養臣都不可能。中國最大的財源就在東南地區，上海更不是取之不盡的富礦，因此，當下並不是爭權的時機，等底定東南，籠絡紳商之後，再向武漢攤牌，還怕衆人不跟隨嗎？蔣介石聽罷，如茅塞頓開，拍案叫好！

從這時起，蔣介石一有機會，就召集所在地的江浙資本家和工商界的頭面人物，進行秘密集會，向他們明確表達：我蔣某人反對武漢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也反對工人運動。這當然得到了與會者的大力贊賞。從此，身處各地的江浙資本家們就像找到了救星一樣，願意出錢出力，盼望着蔣總司令早日打下東南。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舉行。此次全會已一再推遲，因為大家希望蔣介石能夠到會。蔣氏知道此會的目的是衝自己來的，絕不肯為

了聽對自己的批評專門再跑到武漢來，就以前綫戰事為由一再拒絕。因此，全會最後在沒有蔣參加的情況下召開。

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之代表共33人，會議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和國民黨左派勢力主導。會議選出汪精衛（缺席）、譚延闓、孫科、顧孟餘、徐謙、譚平山、宋子文等7人組成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汪精衛為主席團主席。全會的決議集中在三個方面：一、重申擁護孫總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二、提高本黨黨權；三、實行集體領導，防止個人獨裁。

這三個方面統統與蔣介石有關。首先，三大政策本來是既定路線，但是，蔣領導的北伐軍內的軍官中反對這一政策的聲音越來越高。其次，提高黨權意味着收回很多原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黨、政、財等方面的權力。最後，實行集體領導的改變，使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均不設主席或委員長，蔣介石祇是這兩個委員會中的委員而已。很明顯，大家不願意打倒舊軍閥的同時又培養出一個新軍閥。

汪精衛再次被推舉到第一人的領導位置上。他不僅有蔣介石所有的兩個委員職務，而且是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和國民政府常務委員。這些任命和決議，很快就傳到在法國的汪精衛夫婦那裏，他們再次研究了國內形勢，認為東山再起的時機已到，於是興衝衝地由法國啟程，經德國、波蘭、莫斯科，日夜兼程，踏上了歸國之路。